

# 论道教在日本的传播与影响

## ——以日本道教遗迹为线索

梁桂熟, 杨乔君

(天津科技大学 外国语学院, 天津 300222)

[摘要] 历史上,道教不仅在中国文化中占有极高地位,还对邻国日本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然而曾有日本学者以“日本列岛上无道教相关建筑”为理由,否定道教的传入,并认为道教对日本并未产生影响。随着日本道教相关研究以及文史资料与考古文物研究地不断深入,以日本的道教遗迹为线索,可以从长生思想、方术咒语、神仙信仰、星斗信仰等方面可以看出道教在日本的传播及其影响,在现代的日本社会也能看到道教的身影。相关遗迹出土的“人形”及“木简”还有日本各地的“关帝庙”“妈祖庙”等庙观,更是为道教在日本的传播与影响提供了有力证据。这些与道教相关的遗迹不仅描绘出了道教在日本传播的大致轮廓,还从另一侧面反映出了道教对日本文化各方面产生的影响。

[关键词] 道教;日本;传播;遗迹;文物

[中图分类号] B31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6973(2017)04-0013-08

### 一、绪论

道教是中国固有的本土宗教,唐朝时期被奉为“国教”,迎来了发展的鼎盛时期,其影响远播海外。然而,道教在日本的传播却远远不及佛教、儒学,即便道教思想很早就传入日本,却未能以道士、道观、道术和道教仪式的教团组织形式传入,极大地阻碍了道教在日本的传播与发展。因此,道教在日本的影响也就远不如佛教、儒学。相关研究受到的关注也不高。与此同时,其未能以宗教体系在日本传播与发展也成为许多人质疑道教传入日本的关键所在。

虽然在史籍文献中很难找到有组织的教团形式道教的记载,也未能找到古代日本存在道士和实体道观的确证,但是日本的历史和社会文化中却存在许多与道教有关的因素。道教的神仙思想、鬼神观念、方术、斋醮科仪等传入日本后,对日本的政治、宗教以及民间信仰、风俗习惯等产生了重大的影响。近年来日本考古发掘出土了不少与道教关系密切的文物,各地有许多与道教存在密切关系的神社和佛堂寺院,有些地方还建有不少庙观。另

外,在一些文史资料中也能搜寻到许多关于道教的内容。这些与道教相关的遗迹,为道教在日本的传播与影响提供了十分有力的证据。本文试以日本道教遗迹为线索,通过文史记载与考古文物及遗迹相结合的方式探讨:这些遗迹与道教存在着何种联系,并以这些遗迹为考察点剖析道教在日本以何种形式进行传播并对日本产生影响,以此来描绘道教在日本的传播与影响的历史经纬。

### 一、天皇心之所往的神仙境

据日本学者的调查,现在的奈良县高市郡明日香村在7世纪左右曾有过宫殿并建造了道教宫观。“是岁,于飞鸟冈本,更定营地。时,高丽、百济、新罗并遣使进调,为张绀幕于此宫地而饗焉。遂起宫室,天皇乃迁,号曰后飞鸟冈本宫。于田身岭以周垣。复于岭上两槻树边起观,号两槻宫,亦曰天官。”<sup>[1]</sup>这是日本最早的史书——《日本书纪》卷二十六中记载的关于齐明女(655—661)曾在奈良盆地东南隅的飞鸟宫附近的山里,仿造仙人居住在天上的宫殿,建造了类似于“道观”的内容。

对于《日本书纪》中的这段记载,日本的历史学

[收稿日期] 2017-03-10

[作者简介] 梁桂熟(1976—),女,朝鲜族,博士,副教授,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日本文化。

学者黑板胜美在其论文《我国古代的道家思想及道教》一文中认为,齐明女皇再次即位后的第二年(656)就开始在田身岭上营造新宫殿,相继竣工的有冈本宫、两槻宫、吉野宫等。两槻宫既是天皇的宫殿或离宫,也是道观。<sup>[2]</sup>日本历史地理学家千田稔在其著作《中国道教在日本》中也指出,“这是日本历史上唯一的有史料可稽的有关道观的记载。这一事实,说明齐明天皇对道教有过很大的兴趣。齐明天皇在位于飞鸟南部的吉野营造离宫,也是意识到吉野乃仙乡之地”<sup>[3]</sup><sup>57</sup>不过,目前关于两槻宫是否是道观尚存争论,还有待于进一步的考古发掘。

千田稔先生所提到的“吉野乃仙乡之地”是值得注意的。自古以来天皇建造离宫对于选址极为重视,选择吉野,正反映了吉野的与众不同。其实不止齐明天皇对吉野抱有浓厚兴趣,历史上关注吉野的天皇不在少数。在《日本书纪》和《续日本纪》曾有过记载。飞鸟时代末期的持统天皇(686—697)多次行幸吉野,至文武元年(697)八月将皇位让位给孙子文武天皇(697—707)的十一年间就行幸吉野多达31次,除此之外,即位之前与丈夫天武天皇(673—686)去过吉野一次,退位后又去了一次,也就是说持统天皇一共行幸吉野竟有34次之多。另外,行幸吉野的不只有天武天皇和持统天皇,据《日本书纪》记载,雄略天皇(456—479)行幸吉野2次,文武天皇(697—707)2次,元正天皇(715—724)1次,圣武天皇(724—749)2次,之后陆陆续续又有天皇行幸过吉野。

吉野为何能如此吸引天皇们?其原因恐怕与吉野被视为道教中不老不死的神仙境有关。日本最早的汉诗集《怀风藻》中记载的诗题与“吉野”有关的诗歌有20首,如藤原史的《游吉野》、忠臣人足的《游吉野宫》、高向诸足的《从驾吉野宫》、藤原万里的《游吉野川》等。其中忠臣人足的《游吉野宫》写道:“惟山且惟水,能智亦能仁。万代无埃所,一朝逢拓民。风波转入曲,鱼鸟共成伦。此地即方丈,谁说桃源宾。”<sup>[4]</sup>诗中提到的“方丈”是传说中中国东海三神山——“蓬莱”、“方丈”、“瀛洲”的仙山之一,自古以来被道教视为神仙居住的仙境,“桃源”也是仙境之一。从诗中可见,吉野风景宜人,山水皆有灵气被视为充满神仙气息之地。

另外,持统天皇行幸吉野34次之多,也说明了吉野绝非普通之地。持统天皇的丈夫正是日本历史上与道教关系最为深厚的天武天皇。据《日本书纪》记载,天武天皇精通道教的道术,兴建在“占星台”,建立“阴阳寮”。天武天皇的谥号叫做“天淳中

原瀛真人天皇”。“天淳中原”的意思是“铺满了珠玉的天上原野”,“瀛”这一汉字来自于东海三神山——方丈、蓬莱、瀛洲里的“瀛洲”,“真人”是仙人的最高位。<sup>[5]</sup>后世日本使用“天皇”这一称号正是受此影响。作为痴迷于道教的天武天皇的妻子,持统天皇受其影响也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因此,她多次前往被神仙世界的吉野其缘由也就不难想象了。

从天皇们对吉野的多次临幸可以看出,天皇对于长生不老的神仙世界颇为向往。从临幸吉野的天皇们各自在位时间来看,道教的神仙思想最早可能在5世纪左右就已经传入了日本。另外从《怀风藻》中关于吉野的诗歌来看,当时的日本贵族知识分子们对道教仙境的着迷,“他们将海外的神仙世界视为美好生活的典范,将远方异域视为可以弥补现实生活不足的源泉。”<sup>[6]</sup>

吉野之外,日本三重县伊势市的伊势神宫附近的构建也与神仙境关系甚密。伊势神宫是供奉日本天皇先祖“天照大神”的神社,历代天皇在即位时都必须前去参拜,因此与天皇的关系十分密切。据《日本书纪》的垂仁纪卷中记载,天孙降临之后,历代天皇将天照大神祀于宫中。直至崇神天皇(纪元前97—30)畏惧神威,而将之迁出别祭。垂仁天皇(纪元前29—70)皇女倭姬命为寻求令天照大御神镇座之地而遍旅国中,在伊势国内,天照大神诏:“是神风伊势国,则常世之浪归国也,傍国可怜国也,欲居是国。”遂于现今五十铃河畔。

古代伊势国被形容为“常世之浪归国”,“常世”一词最早出现在《日本书纪》卷一《神代上》:“少彦名命行至熊野之御碕,遂适于常世乡矣。亦曰,至淡岛而缘栗茎者,则弹渡而至常世乡矣。”<sup>[7]</sup><sup>44</sup>“常世”含有永恒不变之意。“常世乡”“常世国”指长生不老的地方,又称蓬莱园。<sup>[8]</sup>可见,被称为“常世之国”的伊势地区自古便被视为神仙秘境。伊势神宫的东北方有一座朝熊山,横跨鸟羽市和伊势市,山顶处的佛教临济宗寺院金刚证寺,常被认为是镇守伊势神宫的鬼门。<sup>[9]</sup>因此,人们一直将朝熊山视为神圣的山。

有意思的是,伊势神宫与朝熊山还有神宫附近流淌的五十铃川所构成的组合,正是道教所推崇的仙境所必备要素,名山大川。而这一组合,在唐朝时期遣唐使经常造访的长安城的南郊可以找到范本。长安城的南郊的终南山,其北麓有一座供奉着唐朝皇室先祖老子的宗圣观,旁边流淌着田峪川。终南山素有“仙都”、“洞天之冠”和“天下第一福地”的美称。这种山、道观、川的关系也可放置于伊势。

伊势神宫相当于宗圣观,而朝熊山相当于终南山,五十铃川则相当于田峪川。宗圣观是唐朝王室供奉先祖的宫观,又在长安城南郊,可见地位极高。而伊势神宫供奉着日本先祖天照大神,对日本天皇而言也是极重要的祭祀大社,关乎国家社稷。终南山与朝熊山都是被视为神圣之地。这绝不是简单的巧合,当时日本处于奈良?平安朝时代,正是大量派遣遣唐使赴唐朝长安学习唐文化的时期,遣唐使们看到过长安城外这一布局也是极有可能的。可以说,伊势神宫的这一仙境构建受道教思想的影响很大,也反映了日本统治者对神仙世界的向往。

## 二、神秘的人形呪符及木简

1958年,奈良市佐纪町的平城宫大膳职遗址的井中发现两面写有人名墨书“坂部口建”,的条板削制木质人形,其头、躯干、四肢俱全,两眼与胸口位置各钉有一根木钉,伤害意图十分明显。<sup>[10]349</sup>1980年,平城宫壬生门遗址出土了270枚人形。这些人形出土于奈良时代壬生门前的二条大路北侧的大沟之中,掩埋呈现不规则状,其中还发现有墨书为“重病受死”的人形呪符(见图1)。1984年,平城宫遗址内的东大沟中出土了写有墨书“左目病作今日”的人形。<sup>[10]353</sup>奈良文物研究所调查部长金子裕之指出,“这些人形呪符属天平年间(729—749)物品,用于朝廷的“大祓”神事”。<sup>[11]</sup>



图1 平城京壬生门遗址出土的人形

Fig. 1 Unearthed humanoid figure from the site of Pingcheng  
Beijing Ren Sheng door

10世纪成书的《延喜式》是一部关于朝廷法律条文和祭祀仪式规则的书籍,其中的卷八记载,当时每年六月与十二月,宫廷都会举行“大祓”的仪式。所谓“大祓”,是起源于《古事记》神话的除灾去恶的宗教活动。其中“祝词六月晦大祓”一条中的《东文忌寸部献横刀咒》有着这样的咒文:

谨请皇天上帝、三极大帝、日月星辰、八方诸

神、司命司籍、左东王父、右西王母、五方五帝、四时四气,捧以银人,清除祸灾,捧以金刀,请延帝祚。东至扶桑,西至虞渊,南至炎光,北至弱水,千城百国,精治万岁,万岁万岁。

“皇天上帝”、“三极大帝”、“东王父”、“西王母”、“五帝”等一连串的受祭神格,全部采自道教的神谱。咒文中的“扶桑”“虞渊”“炎光”“弱水”是中国秦汉文献中划定四方之界时常用的疆域名称。可见,道教神灵已出现于神道仪式中。

从那些被木钉钉住某处以及墨书具体内容的人形呪符来看,属诅咒型人形。北京大学王育成教授将这些出土的人形与中国出土的古代人形进行对比后,认为“日本这种诅咒人形也是受到中国古代诅咒人形的影响而产生的。奈良平城宫遗址大膳职等地所出诅咒人形,或为胸腹‘题刻姓名’或是‘刺心钉眼’,就似活脱脱的中国古文献记载的人形诅咒术的实践活动遗物”。另外,他还指出“我估计此术传入日本的时间也是唐代,当时日本大量吸收、模仿中国文化(包括宗教文化),诅咒人形亦随势导入”。<sup>[12]</sup>

这些8世纪时期的人形呪符,随着日本学习唐朝的风潮传入了日本,带有极其浓厚的道教色彩。道教的法术有很多,如占卜、求签、符咒、祈梦等。此类人形呪符正是道教符咒的一种,通过人形符咒来代替人接受诅咒,通过使用恶毒的诅咒来驱鬼驱邪、攘除不详,使用祈祷的祝词来实现具体的愿望。天皇在“大祓”念唱咒文并使用人形正是道教符咒方术的一种。而后这些巫术诅咒流入民间引起了一些社会问题,朝廷曾多次下令严厉禁止,还是未能彻底清除。

除了人形呪符外,另一种出土的文物与道教密切相关,即呪符木简。

1961年,日本静冈县浜松市的伊场遗迹,出土了约数十个写有墨书的木简。这些木简的表面两处和内侧一处,共计三处写有“急急如律令”的文字。<sup>[13]</sup>同年,东北部的宫城县多贺遗迹出土的木简上有用墨书描写的“急急如律令须病人吞”字样。<sup>[14]</sup>1978年,山形县的堂之前遗迹出土了3枚墨书有“山(文字:上尸下绳)急急如律令”的木简(见图2)。<sup>[15]</sup>1987年,滋贺县彦根市的妙乐寺遗址,出土了6枚写有“天罡 急急如律令”的木简(见图3)。<sup>[16]81</sup>另外,大阪的国府遗迹等各地也相继发现了写有“急急如律令”的相关木简。

“急急如律令”是中国道教经典和施法仪式中十分常见的一种咒语,每逢召将、驱邪、发符、施令

等时候,皆会使用。据说“急急如律令”是中国汉朝时期书写在公文末尾的文字,意思是上述内容如同律令,必须尽快遵照执行。六世纪后半期,成书于中国南北朝时期的道教教典《玄都律文》中“急急如律令”开始作为退散恶魔的语句被使用。



图2 山形县堂之前遗址木简

Fig. 2 Site of inscribed wooden slip in front of Shan Xing country government

据考证,伊场遗址与多贺遗迹木简是公元8世纪左右用于大祓的祭具,大致处于在日本的奈良朝末期至平安朝初期,堂之前遗迹与妙乐寺遗迹的木简则是平安末期的祭具。<sup>[16]82</sup>而从出土木简的遗址分布来看,静冈县的伊场遗迹位于中部地区、宫城县多贺遗迹及山形县的堂之前遗迹位于东北地区、大阪的国府遗迹与滋贺县彦根市的妙乐寺遗址则位于关西地区。“从这可以看出,道教在古代传到了日本,并在各处都有其身影,出土的木简就是其最好的证据”。<sup>[7]126</sup>另外,滋贺县彦根市的妙乐寺遗址的“天罡 急急如律令”中包含了道教的北斗信仰。“天罡”即北斗七星,道教认为,自然界天地的运转、四时的变化、五行的分布,以及人间世事凶吉否泰皆由北斗七星所决定,北斗七星在道教信仰中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将北斗与道教咒语的结合,不仅体现了对星辰的崇拜还增强了咒语的灵性。

成书于平安初期的《内裏儀式》和末期的《江家次第》中也出现了“急急如律令”这句话。据《江家次第》记载,圆融天皇(959—991)在新年元旦之际,行四方拜后,念唱咒文:“贼寇之中过度我身,毒魔之中过度我身,毒气之中过度我身,毁灭之中过度我身,五危六害过度我身,五兵六舌之中过度我身,厌魅之中过度我身,万病除愈,随心所欲,急急如律令”<sup>[17]</sup>。成书于镰仓时期专门纪录平安时代为止的年中行事《年中行事秘抄》中记载着,立春之日早朝上,天皇饮若水之时,都要念唱“万岁不变水,急急如律令”,这已经成为惯例。可见,这些写有“急急

如律令”的木简,与日本古代的国家祭祀有着密切关联。天皇通过念唱带有道教浓厚色彩的咒语,祈愿神灵保佑自己度过劫难、祛除灾病。将道教的咒语融入于国家祭祀之中,也是对道教咒语拥有强大神力的一种认可。日本学者和田萃指出,“就连天皇念唱的咒语中也能看到咒句‘急急如律令’,可见经过奈良?平安时代,道教信仰已经完全渗透进来了。”<sup>[18]</sup>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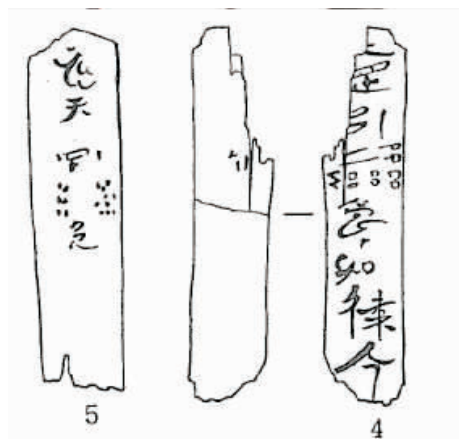


图3 滋贺县妙乐寺遗址出土木简

Fig. 3 Unearthed wooden slips from the site of Miaoluo Temple in Shiga County

值得一提的是,经常被认为是“日本版道教”的修验道,其始祖为生活在飞鸟至奈良时代的役小角。修验道是在日本传统的山岳信仰的基础上融合佛教密教的教义、道教的神仙信仰与咒术而形成的,其山岳信仰、教理仪式、符咒咒术与道教有着十分紧密的联系。修验道的一大特点是将幽静的山岳作为修行的重要场所,另一大特点就是非常注重符咒的使用。修验道大量地借鉴了道教的符咒来丰富自己的灵验力,其咒语末尾处大都有一句道教咒语“急急如律令”。

修验道在日本的奈良及平安朝时期,以其独特的山岳修行和道教的符咒方术吸引了很多入道修行者,尤其在社会动荡的平安朝末期,百姓们生活困苦向往山中的极乐净土,大大促进了修验道的发展。带有道教色彩的咒符木简能在日本广泛的传播开来与修验道无不关系。

在现代,这句“急急如律令”的咒语也经常使用,其影响已经渗透在日本民俗之中。京都的祇圆祭时做的粽子上就附有“急急如律令”这句咒语。伊势地区的名门世家里摆放的镜饼中附着的木牌上也写有“急急如律令”。另外,樱井市的鹿路神社的弓射神事的祭文,其他的关于占卜和咒语的书也都看到这句咒语。奈良县的田原本町、僵原市、樱井市和当麻町一带的居民住宅的屋脊瓦上就

有“急急如律令”咒语的字样。<sup>[19]53</sup>

### 三、神社与寺院里供奉的“仙人”

日本京都市左京区修学院的“赤山禅院”属天台宗,与中国有着很深的渊源。赤山禅院是平安时代按照慈觉大师圆仁的遗愿建造的,其中的主佛赤山大明神是从大唐赤山(今山东省荣成县)请来的泰山府君,在日本成为阴阳道的祖神。福井康顺认为,“在道教诸神中,对日本影响最大的是阴阳道引进的‘泰山府君’”。<sup>[20]</sup>

平安时期838年,日本天台宗慈觉大师圆仁为求佛法跟随遣唐使来到唐朝,随船回国途中,在海上遭遇暴风雨和雷击,船漂流至赤山(山东威海)时,圆仁叩拜赤山寺中供奉的赤山明神,祈祷神明保佑自己平安归国,并誓愿:“到本国之日,专建神社,永充祭祀。”圆仁回到日本后,积极弘扬所学佛法,感念赤山明神(泰山府君)的灵佑,本想按誓愿建造寺院以祭祀神明。然而,圆仁在去世前也未能实现建造赤山禅院的心愿,而后其弟子安慧谨承遗志,建造了赤山禅院。

泰山府君是中国五岳之首东岳?泰山的神灵,从东方主生的思想出发,泰山被视为“天地大德”的汇聚之所,帝王的腾飞之地,故为中国古代皇帝举行封禅祭祀之地,道教视其为天上太一神在地上的居住之所,故称太一神为“泰山府君”。<sup>[21]</sup>道教还将泰山视作治鬼之所,死后灵魂所归之处。泰山府君为冥府之王,是惩恶扬善、济生渡死的正义之神。道教经典《云笈七签》卷七十九云:“东岳泰山君领群神五千九百人,主治死生,百鬼之主帅也,血食庙祀所宗者也。世俗所奉鬼祠邪精之神,而死者皆归泰山受罪考焉。”<sup>[22]</sup>

赤山禅院的建造推动了泰山府君信仰在日本的传播。日本的阴阳道将泰山府君视为祖神,由于阴阳道的安倍祥明的大力推广,“泰山府君祭”成为阴阳道的代表性大祭。大约从平安朝中期起,由阴阳师主持的“泰山府君祭”,将泰山府君信仰贯穿于日本各类祭祀活动中,上至朝廷的仪式典礼,下至百姓的冠、婚、丧祭礼,因宣扬泰山府君特有的主宰生死、求福消灾等重视实际利益的功能,泰山府君祭逐渐发展成国家祭祀受到热烈推崇,日本天皇又尊其为“赤山大明神”。<sup>[23]</sup>“泰山府君祭”成为富有日本民族文化特色的宗教祭祀活动。阴阳道将“泰山府君”改造成为与日本人现实利益的神明,“泰山府君祭”也被纳入日本神道教的神祇体系之中。可见,泰山府君信仰已经融入日本文化之中,成为其国家祭祀与民俗生活中的一部分。

今天,泰山府君仍然是日本神道信仰中最具有道教特色的神灵之一。京都市左京区修学院的“赤山禅院”依然尚存,每年5月5日都会举行泰山府君祭端午大护摩供。禅院中的泰山府君造像也保存至今,其神造形有如毗沙门天,系武将装束,身着红色战袍,两手分持弓箭,威风凛凛。这位“威灵显赫”的泰山府君“凌万里之沧溟”而在东瀛“落户”的故事,应是泰山文化之影响远及世界的一个例证。<sup>[24]</sup>

道教神明供奉于寺院神社的典型不止“泰山府君”,另一典型则是“妙见菩萨”。

日本大阪府能势町的妙见山上有一座所属日莲宗的寺院——“能势妙见堂”,里面供奉着“妙见菩萨”,是附近一带曾经的领主能势氏一族的守护神。此外,熊本县八代市妙见町的八代神社、福岛县相马市中村的中村神社也供奉着妙见菩萨,是日本供奉妙见菩萨最负盛名的地方。能势妙见、八代妙见、相马妙见并称为“日本三大妙见”。另外,还有千叶县千叶市中央区的千叶妙见神社、大阪府交野市星田的星田妙见宫等,日本的各地还有许多与妙见菩萨相关的神社和寺院。

“妙见菩萨”也被称为“妙见尊星王”、“北辰妙见菩萨”,也是“镇灾灵符神”。妙见菩萨披发裸足,手持宝剑,一副英勇武将神资。密教的经典之一《七佛八菩萨所说大陀罗尼神咒经》曾有记载道:“我北辰菩萨名曰妙见,今欲神咒,拥护诸国土。所作甚奇特,故名曰妙见。处于阎浮提,众星中最胜。神仙中之之仙,菩萨之大将。”<sup>[25]</sup>

妙见菩萨虽然称为“菩萨”却与印度佛教中菩萨并不相同,它是道教星辰信仰中的北辰北斗信仰与佛教融合后的产物。“北辰”即北极星,道教认为,北辰是永远不动的星,位于上天的最中间,位置最高,最为尊贵,是“众星之主”也是“众神之本”,因此对它极为尊崇。<sup>[26]</sup>另外,自古也有把“北斗”当作“北辰”,“北斗”即指北斗七星。傅洞真《北斗经注》说:“斗星所主,延寿度厄,保命益算,消灾散厄扶衰,是故有回死注生,消灾度厄之功。”道教认为北斗主掌人间祸福。妙见菩萨实际上是北辰北斗人格化后的神明,拥有强大神力。大阪的星田妙见宫的幕布上就画有以北斗七星为中心的八卦图文。

据《妙见宫实纪》、《八代神社记》记载,公元680年秋,妙见菩萨乘神兽“龟蛇”从中国(浙江宁波)渡海来到日本熊本八代郡土北乡八千村竹原津。“龟蛇”乃道教方位中北方玄武之象,《礼记·曲礼上》云:“行,前朱鸟而后玄武……‘玄武’乃龟蛇”。可



见,妙见实际上是道教神明。据说,妙见菩萨在此停留三年之久,当地人将之尊为保护神加以供奉。795年,桓武天皇下令在此修建妙见宫,这是现在的八代神社内三宫中的上宫。后来,二条天皇于1160年、后鸟羽天皇于1186年分别建造了妙见宫的中宫和下宫。<sup>[27]</sup>

镰仓时代(1192—1333),由于北斗第七星被称为破军星<sup>①</sup>,故妙见菩萨作为武士的保护神而受到敬祀,镰仓末期以后,与日莲宗结合的妙见被各地寺院请为保护神。千叶氏、相马氏为主的领地建造了不少妙见堂,即现在的千叶妙见神社、相马中村神社等。妙见信仰也为神道所采用,各地建造了北辰社、妙见社等祠庙,与寺院的北斗堂、妙见堂并立。这些供奉着妙见菩萨的神社和寺院,大多数同时也供奉着“天之御中主神”,既日本神话中开辟天地,生于高天原的造化三神之一。将“妙见菩萨”与“天之御中主神”共同供奉,既体现了日本神佛习合,又体现了神教、道教、佛教混同的特点。可见,道教的神明以借助日本佛教与神教发展的形式在日本得以广泛传播开来,并影响着日本人的宗教信仰观念,但同时其本身已被融入日本文化之中。

如今,八代神社的“妙见祭”至今仍是九州地区的三大节日之一,2011年3月被指定为重要的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每年11月熊本的八代地区都会举行热闹非凡的“妙见祭”。人们相信,信仰妙见菩萨能免除灾祸、四海太平、五谷丰登。这也使妙见信仰中的道教星斗信仰深入到日本的民俗活动之中。

#### 四、虽无道士却敬神仙的庙观

道教是多神教,其信仰的神灵种类繁多,除了有三清、四御等尊神,还有关帝、文昌、妈祖、雷公、土地神、门神、灶神等职神,有的传入日本后在民间社会产生一定的影响。

在日本横滨市的中华街有一座充满中国庙宇风格的“关帝庙”,也是日本国内目前最大的一座“关帝庙”。横滨的关帝庙建于1873年,庙宇雕梁画栋,金碧辉煌。汉白玉的牌坊和护栏,云飞龙走。两只青石雕狮雄踞在大殿前,大殿里中间供奉关帝,两侧供奉观音和龙王。在殿角还供奉土地公公。<sup>[28]</sup>然而,1986年元旦,大殿毁于大火,后经侨界

共同努力,聘请中国的良师巧匠斥资重建。1990年建成开光,重新开放。庙中香火旺盛,横滨附近如东京和关东地区的华人都到此庙烧香祈祷。元旦、春节,都有数万华人男女以及同华人有关的日本人来此地烧香。

关帝是道教的神灵之一,关羽的忠义英勇深入人心,后世将其尊为关帝,自明清以来由于历代帝王的提倡,它已经成为忠和义的象征。关羽不仅作为武神受到人们的尊崇,同时也被视为商业神,在中国民间享有极高的地位。宋元之际,也就是日本的平安至镰仓时期,中日之间的贸易往来十分频繁,中国的商人们进行贸易活动的同时也把关帝信仰带入了日本,而后随着两国贸易的发展以及华人移民的迁入,长崎从17世纪到18世纪起,华侨陆续兴建了兴福寺、崇福寺、福济寺和圣福寺等寺庙,各寺庙都有关帝殿堂,供奉关帝。关帝信仰从长崎开始传播到日本各地。在华侨中,关帝成为华侨心里的归宿,发挥着相当的凝聚力作用。

除了横滨外,“在距今不远的时代,华侨们在长崎、神户、函馆等地建造的把关羽作为财神供奉的关帝庙,也显示着与民间道教的种种关联。”<sup>[3]86</sup>其中属横滨、神户及函馆的关帝庙规模较大。神户关帝庙建于1888年,坐落在南京町内,二战前属于黄檗宗<sup>②</sup>,战后神户关帝庙的住持属于天台宗,但其黄檗宗的传统至今维持。神户关帝庙的山门上有对联:“精忠扶汉业,德泽荫侨民”,表达了华侨们心怀祖国、祈望祖国护佑侨民生存下去和生活美好的强烈愿望。北海道函馆的关帝庙建于1910年,目前也是日本的中华会馆的主要活动场所。

这些供奉关帝的庙宇,是地道的中国建筑,确实是道教的。但是,据我国学者陈耀庭调查研究,日本的这些华侨道观,从来没有道士,据说也从未举行过道教仪式。这些庙观或者由侨民公推的董事会管理,或者由日本和尚管理。<sup>[19]50</sup>由此可见,近代日本虽然建有了道教庙观,却与中国本土道观有所区别,有些庙观还属佛教宗派,管理人员也非专职的道士。

日本各地除了“关帝庙”为显著的道教庙宇外,还分布着许多“妈祖庙”。

妈祖,又称天妃、天后、天上圣母,是道教神明之一。宋代以来就受到东亚沿海地区历代船工、旅

① 道教尊北斗七星为北斗七星君,七星君各有称谓。分别为:北斗第一阳明贪狼太星君、北斗第二阴精巨门元星君、北斗第三真人禄存真星君、北斗第四玄冥文曲纽星君、北斗第五丹元廉贞纲星君、北斗第六北极武曲纪星君、北斗第七天关破军关星君。

② 日本佛教黄檗宗,由中国僧人隐元为开始祖师,因此,黄檗宗寺庙里供奉关帝作为护法神,以中文诵念经文。

客、商人和渔民的共同信奉,在海上航行时人们都要祭拜妈祖,以祈求顺风平安。“妈祖”与“关帝”的传入相同,都是在日宋贸易频繁时期,通过中国商人传入日本。日本冲绳地区现在还有久米村上天妃宫、那霸的下天妃宫和久米岛天后宫等道观,供奉妈祖。

历史上,冲绳又称“琉球”,明朝时期,琉球与明朝建立朝贡关系后,明朝廷将精通各种技术的闽人赐给琉球国,闽人从福建来到冲绳后,为了表达思念故土之情以及族人共同进行宗教生活的需要,相继修建了天尊堂、天妃庙、关帝庙等,除盛行的关帝、天妃信仰外,还建有供奉着三清、玉皇、龙神、文昌、土地神、灶神、城隍神等道观,以冲绳为中心的琉球列岛成为今天日本保留道教文化遗迹最多的地区,以实物的方式展示着道教在琉球的传播与影响。<sup>[29]</sup>

另外,据有关报道,在日本的萨摩半岛、鹿儿岛的片浦港、长崎、平户、岐阜市、茨城县的矶原、珂奏,甚至在本州岛最北部的青森县都建有妈祖庙。经过漫长历史时期的发展变化,至20世纪80年代日本共有妈祖庙100余座。<sup>[30]</sup>妈祖随着在日华侨移民的脚步传播到了日本各地,可以说有华人的地方就有妈祖。

虽然“关帝庙”、“妈祖庙”等庙观是随着华侨移民迁入日本而建立起来的,有些还有着上百年的历史,是实实在在的道观,但在日本始终未能建立独立教团,也无专职道士,呈现出“虽无道士、却敬神仙”<sup>[31]</sup>的特色。可以说,近代日本的道教传播主体基本是华人华侨,其影响多与民俗相关,在华人圈的影响最大,同时逐渐融入日本民俗之中。

除此之外,值得一提的是,二战后,日本兴建了一些不属于华侨系统的道观设施,虽然规模很小。例如,在东京西郊大岳山有多摩道院,代表人物是笹目秀自称是仙人,收养弟子并且扶乩占卜。多摩道院自称道教宫观,受到日本新宗教之一的大本教的支持。东京还有一个仙道连,创立人是田中教夫。田中教夫自称“五千言坊玄通子道士”,二战前曾在北京白云观修行。“五千言”指的就是《道德经》仙道连以不老不死的仙境作为理想。另外,福岛县的磐市还建有所谓的日本道观,其名可音译为“池拔利”,创始人是早岛正雄。早岛正雄自称是在台湾学道,台湾嗣汉天府张天源宗师授之予大师的称号,为龙门派第十三代传人。磐市的道观为总部,其在全国各地一共还有11所道学院,各学院有总部认可的道家指导员,向各年龄层的学员展开身心健康的“道家三种气的养生法”。

## 五、结语

追古溯今,道教在日本传播与影响的漫长历史过程中,一方面体现了道教在日本传播与影响的特殊性,即道教与日本文化进行不断地碰撞、融合,其内涵与形式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综合上述文章的分析,可见,道教的长生信仰、方术呪符、神灵信仰、星斗信仰等道教因素已经传入古代日本,并且通过与日本的佛教、阴阳道、修验道相融合的方式得到了进一步发展,对日本的政治、宗教以及民俗等方面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不过,道教不再以其原有的形态出现,而是糅合了许多日本式的东西后,隐含在日本文化深层之中,越来越具有“日本化”倾向。因此,道教的传播及影响与东传日本的佛教、儒学是完全不同的,其传播依附于其它宗教,其影响零零散散地渗透于日本文化各方面,令人不易察觉。

另一方面也体现了道教在日本传播与影响的局限性,道教虽然借助与日本的佛教、神道融合的方式得到发展,也限制了自身的发展及其对文化的影响。道教的一些方术咒语、神仙信仰、鬼神观念等为日本的佛教、神道或者民俗吸收后,已经成为“内文化”,其影响只存在于日本文化的一角片隅,其发展也包融于日本文化之中难以呈现独立性;而近代的道教传播与影响,传播主体主要为中国的华人华侨,其影响也多体现在民俗方面。另外,即使道教思想文化已经为日本文化所受容,其标志性的建筑——道观也已经出现在日本本土,却始终未能形成有组织性的正式宗教教团形式,这些都使得道教的传播与影响带有很大的局限性。

另外,道教在日本传播与影响也从另一侧面反映了日本文化的包容性及选择性,道教传入日本后主要通过与日本的宗教、民俗文化融合的方式得以传播,日本文化能够包容外来的道教,但并非是全盘接受,而是根据自身的需求对道教中进行有选择性的吸收,并加以改造,使其更符合本国需要,最终融入于自身文化之中。如今,日本还存在一些道教活动,福岛的道观还有道士在修行,这些都是值得关注的现象。

## 〔参 考 文 献〕

- [1] 舍人亲王.日本书纪(卷二十六)·齐明天皇[M].东京:岩波书店,1969:42.
- [2] 野口鐵郎.道教と日本[M].东京:雄山阁,1996:45.
- [3] 千田稔.中国道教在日本[M].蔡毅译.北京:中华书局,2002.
- [4] 小島憲之校注.日本古典文学大系69[M].东京:岩波

- 書店,1964:238.
- [5] 千田稔著,蔡毅译,中国道教在日本[J]. 文史知识, 1997(2).
- [6] 徐臻:‘怀风藻’的山水与道教文化[J]. 日语学习与研究,2013(3).
- [7] 福永光司,千田稔,高桥徹. 日本の道教遺跡を歩く [M]. 东京:朝日新闻社,2003.
- [8] 舍人亲王. 日本书纪(卷一)・神代上[M]. 东京:岩波书店,1969:10.
- [9] 下出积典. 常世国性格[J]. 东方宗教,第3期,1953.
- [10] 岸俊男. 日本的古代9・都城的生活[M]. 东京:中央公论社,1987.
- [11] 金子裕之. 平城京と祭場[J]. “国立”歴史民俗博物館研究報告,第3期,1985.
- [12] 王育成. 中国古代人形方术及其对日本的影响[J]. 中国历史博物馆馆刊,第1期,1997.
- [13] 浜松市教育委员会. 伊场遗迹发掘调查报告书第一册 [M]. 静岡:开明堂,1977:24.
- [14] 奈良国立文化财研究所. 多賀城跡出土の木簡[M]. 东京:吉川弘文馆,1976:25.
- [15] 山形县教育委员会. 堂の前遺跡昭和53・54年度調査略報[M]. 山形:大风印刷,1980:8.
- [16] 葛野泰树. 妙楽寺遺跡出土の呪符木簡について・纪要第2号[M]. 兵库:日兴商会,1989.
- [17] 大江匡房,渡边直彦. 江家次第[M]. 东京:神道大系编纂会,1991:438.
- [18] 和田萃. 日本古代の儀礼と祭祀・信仰[M]. 东京:塙书房,1995:32.
- [19] 陈耀庭. 道教在海外[M]. 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0.
- [20] 福井康顺等监修,朱越利等译. 道教[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24.
- [21] 孙亦平. 论中国道教对日本阴阳道的影响——以阴阳道的泰山府君信仰为例[J]. 湖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1).
- [22] 陶弘景. 道藏・第十册[M]. 北京:文物出版社,1988:561.
- [23] 严绍璁,源了圆. 中日文化交流史大系・思想卷[M]. 浙江:浙江人民出版社,1996:130.
- [24] 泰安市泰山区档案馆. 周郢文史论文集・泰山历史研究[M]. 济南:山东文艺出版社,1997:287.
- [25] 高楠顺次郎. 大正藏・七佛八菩萨所说大陀罗尼神咒经[M]. 东京:大藏出版社,1932:547.
- [26] 潘崇贤、梁发. 道教与星斗信仰(上)[M]. 山东:齐鲁书社,2014:32.
- [27] 孙亦平. 道教在日本[M]. 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6:248.
- [28] 卿希泰. 中国道教史(第四卷)[M]. 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6:583.
- [29] 刘国柱. 湄洲祖庙连四海[J]. 瞭望,第46期,1987.
- [30] 林文豪. 海内外学人论妈祖[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318.
- [31] 李学玲、单承彬. 道教文化在琉球的传播[J]. 世界宗教文化,2014(3).

(责任编辑:谢光前)

## Discussion on Taoism's Spread and Influence In Japan ——Clues to the Japanese Taoist relics

LIANG Gui-shu, YANG Qiao-jun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 Tianjin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Tianjin300222, China)

**Abstract:** Taoism not only plays a very important role in the history of Chinese culture, but also has a profound impact on neighboring Japan. However, Japanese scholars have denied the spread of Taoism for the reason that “there is no Taoist architecture in Japan”, and argued that Taoism did not have an impact on Japan. With the study of Taoism in Japan and the deepening of the study of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materials, taking the relics of Taoism in Japan as a clue, we can see the spread and influence of Taoism in Japan from these aspects such as the thought of eternal life, divination spells, deity belief, stars of faith and so on, so can we in current Japan society. The related relics unearthed “humanoid” “wooden plate” and the “Guan Yu Temple” “Ma Zu Temple” around in Japan, is to provide strong evidence for the spread and influence of Taoism in Japan. The Taoism's relics not only depict the general process of Taoism's spread in Japan, but also reflect the influence of Taoism on Japanese culture.

**Key words:** Taoism; Japan; Spread; Relics; Historical Relics